

图片来源: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 鲜为人知的古籍“宝库”

■本报记者 袁一雪

近日,一则“中科院馆藏珍籍首次全貌示人,已出版第一辑50册目录公布”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流传。文章中提到的珍籍所在地——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难道不应该是自然科学的大书库吗?为何会有古籍?而且,据文章介绍,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不仅包括敦煌写本、西夏文钞本、宋契元刻、活字本、套印本,还有大量稿本、抄本、名人字画、契约、家谱等。

带着好奇,本报记者探访了位于北京北四环西路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收藏古籍的地下书库。

## 古籍从何而来

古籍资料收藏室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文献中心)的地下一层,占地1000多平方米。50余万册古籍的藏书量,让文献中心成为国内研究型专业图书馆中古籍藏量最大的图书馆。

在文献中心工作了36年的研究员罗琳告诉《中国科学报》,文献中心在人文内郭基金收到中国、美国、英国共60多位学者的慷慨捐款,同时奖学金的首批招募工作也已开始。本栏目特别约请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特聘教授刘钝,撰文缅怀故人故事。

日本,但是还款的方式不是直接退还“真金白银”,而是以资助中国的文化事业等方式进行归还。为此,日本在中国成立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并雇用了一大批中国人文科学学者从事“文化事业”。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设“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和北京“东方文化事业图书筹备处”。其中,“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同在北京大甜水井胡同9号,主要为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购买、保存、提供图书文献数据,所购买的书籍均为中国古籍。1926年至1937年,“东方文化事业图书筹备处”总计购买了15420部、165999册古籍,耗资银元399675.01块。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之藏书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属“东方文化事业图书筹备处”的藏书,均由国民党“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收。1947年冬,在傅斯年先生主持下,这批古籍中一部分迁往了台湾,现藏于台北“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傅斯年图书馆”中。余下的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在1950年成立时接收,是今天文献中心约50万册古籍藏量的基础。

天然的古籍保存地

## 天然的古籍保存地

记者探访地下书库的那天,北京室外温度零下3摄氏度,收藏室门口的温湿度计却显示此时温度为16摄氏度,湿度为20%,没有落地窗也没有冬日暖阳,这间“不见天日”的地下书库却十分舒适。罗琳告诉记者,地下书库里既没有除湿或保湿的设备,也没有恒温的设备,却一年四季保持在20摄氏度上下的温度和适宜的湿度,是“天然的古籍保存地”。

地下书库一排排整齐的、装满古籍的密集书架,上面贴着分类标签。这些古籍按照经、史、子、集被分为四大类,再向下细分若干门类。门类众多是因为这里的古籍所含类别包罗万象,有天文、地理、农学、哲学、文学等。

由于这里温度与湿度适宜,加之此前在购买时选择的都是比较优质的古籍,如今古籍很少有虫蛀、发霉等问题,这里存放的古籍很少有需要修复的。

文献中心50万册古籍包括唐人写经、西夏文写本、宋契元刻及大量稿本、抄本、名人字画、契约、家谱

等,尤以地方志和明清诗文集著称。因丰富的珍贵古籍,文献中心被确立为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文献中心古籍馆藏的镇馆之宝之一,是1997年罗琳在王府井库房中寻得的一块铜板——《平定回疆得胜图——柯尔坪之战》(高58.3厘米、长93.3厘米)。这块铜板是国内仅存的几块铜板之一,而且是最大的、唯一的一块薄型铜板。现在很多学校、科研机构在介绍铜版印刷时都会将这块铜板借去。

## 为更多读者服务

文献中心在古籍研究者中相当有知名度,因为里面不少善本在其他图书馆早已难觅踪影。如果你提前与文献中心预约,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还可以与古籍来个“亲密接触”。

与古籍“约会”的地点位于文献中心五层的古籍阅览室。在阅览室一角,有个小小的电梯窗口,这是将古籍从地下书库“运送”到五楼的专属电梯。记者在阅览室的留言簿中,看到了天南海北很多读者的留言。一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徐芄这样写道:“这里的阅读环境可以

与美国最好的善本室相媲美……我愿意回到这里,今后有机会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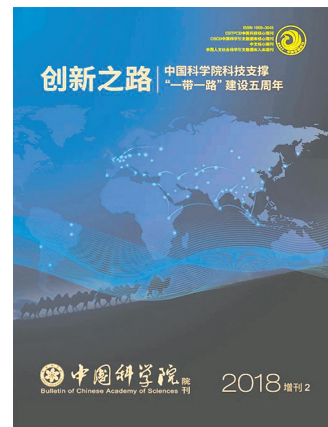
为了保护古籍,也为了让古籍为更多爱好者服务,罗琳和古籍整理团队的同事一同细细进行了古籍整理工作,并将一部分善本影印成册,出版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藏古籍珍本丛书”。这套丛书计划共300册,分6辑出版,目前已经有50册正式出版。

罗琳介绍说,这次入手的古籍中约80%的稿本具有唯一性,有着特殊而珍贵的史料价值。而在挑选另外20%的抄本时,他们进行了认真比对,入选书籍有的已成孤本,有的与刻本多有差异,有的则对文献的流布、考证和校勘等研究都极具价值。

此外,他们严格鉴定版本,规范著录,并对异形开本和浮签等在扫描时均进行了特殊处理。为了将古籍原样呈现到读者面前,影印工作也更为精心。当读者翻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藏古籍珍本丛书”,如果不是纸张有所区别,仿者就是一本真的古籍在手。据介绍,接下来古籍的选择,已经计划好分别以刻本、套印本、彩绘本为主题,可以入选的书目也正在挑选中。

## 速读

论文题目:科学共同体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  
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袁江洋  
出处: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22



《中国科学院院刊》近期刊出《创新之路——中国科学院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五周年》增刊,对5年以来的中科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进行系统梳理。2013年,我国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发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将其作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平台。如今5年过去,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一带一路”建设之路值得回顾和思考。

针对“一带一路”建设,论文作者袁江洋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将科学共同体提升为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在他看来,基础建设等经济领域的合作并不能持久稳定地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应该以文化认同为目标。在对人类文明史进行大尺度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和通道,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互渗。人类思想成就和物质成就的汇聚与整合是文明进步和文化创新的基础和前提。重新审视科学和科学文化诞生的历史,可以发现科学文化正是在人类思想大汇聚大整合的基础上产生的。

科学文化以“追求真理、追求至善”为最高价值,并非一味排斥人类情感和自由意志的排他性文化。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跨种族、跨肤色、跨宗教、跨文明的普遍文化,科学文化的全球发展成为沟通各主要文明的重要桥梁。科学家在弘扬理性主义精神、沟通不同文明方面具有一份特殊的责任;科学共同体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

在当前逆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之下,我国能否通过推动科学文化建设、促进科学共同体建设,来实现“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目标,还需要持续地在实践中进行检验。

论文题目:为什么古人不喜欢创新  
作者: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张卜天  
出处:科学文化评论,2018,15(03)

## 说史

### 编者按

2018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何丙郁先生捐赠50万英镑,在李约瑟研究所设立“何丙郁中国科技史奖学金”。之后,科学史界以此为基础设立基金,并向社会各界发起募捐活动。截至12月底,何丙郁基金收到中国、英国、美国共60多位学者的慷慨捐款,同时奖学金的首批招募工作也已开始。本栏目特别约请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特聘教授刘钝,撰文缅怀故人故事。



何丙郁和李约瑟(1990年前后)  
图片来源:剑桥李约瑟研究所



1992年在剑桥何丙郁先生寓所聚会(左起:何丙郁、黄兴宗、冯美瑶、刘钝)。  
刘钝供图

# 剑桥义工何丙郁

■刘钝

剑桥有个主要从事中国与东方科学技术文明研究的李约瑟研究所,创建者是中国人熟悉的李约瑟博士。1987年9月,研究所的法人机构(当时叫东亚科学史信托公司)作出决定,委任时任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讲座教授的李约瑟为候补所长。考虑到李约瑟本人和各方面人士的信任,更为了使老博士在西方开办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薪火相传,何丙郁先生毅然接受了这一职位。1990年4月,何先生抵达剑桥正式接任已经90岁高龄的李约瑟,不拿分文地在剑桥当了12年的无薪所长。

此时何先生已是世界知名的学者,早年即加入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计划,曾在多家大学担任学术主管和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广及中国天文学史、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以及医药学、数学、炼丹等,在海峡两岸、东南亚和日、韩等国都有很高的人望,跑到剑桥当一名无薪所长,除了筹钱维系研究所的生存外,还要应付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应该说是一件非常棘手而于个人得不偿失的事。多年后何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放弃澳大利亚讲座教授月薪的收入,而跑到剑桥当义工,从经济上看是一件极不上算的作为,我也很难向关心我的局外亲友解释自己的行动。可是在李约瑟研究所当时的场合,不领薪有不领薪的好处。一个拿钱的所长在当时不仅会树大招风,而且要讨好几个意见不同的东家,这样的所长我恐怕是做不下去的。”

当时支持李约瑟研究所的机构有三家,即剑桥的东亚科学史信托会,以及分别设在香港和纽约的东亚科学史基金会。围绕着研究所的运作出现分歧是难免的,剑桥信托会认为拥有管理研究所的全权,香港和纽约方面则认为作为股东有权干预研究所的事务,再加上李约瑟本人

和他身边的一些老朋友,何先生发现自己有四个“雇主”,但为人处事的洒脱与宽厚无私使他在困难环境中游刃有余自如,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免得顾虑四个不同意见的雇主之间的分歧,这是唯有当一个义务所长的人才能享受的权利。”

何丙郁先生1926年生于马来西亚一个叫甲板的小镇的华裔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他大学主攻数学和物理,毕业后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当物理教师,上世纪60年代成为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70年代出任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当代亚洲研究院首任讲座教授兼院长,80年代主持香港大学中文系并任讲座教授,又兼任柏立基学院院长。他精通多种语言,甚至包括一些方言。“一身兼任了科学史工作的筹资者、组织者、宣传者和研究者,以他特有的才能,穿梭于欧亚澳美四洲”(席泽宗院士语),当之无愧地入选澳大利亚文学院、台湾“中研院”,以及总部设在莫斯科的欧亚科学院院士。

1995年李约瑟博士溘然长逝。何丙郁先生殚精竭虑、辛劳奔走,把研究所的学术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在他和同事以及继承者们的努力下,李约瑟研究所修复和发展了同剑桥大学的良好关系,不但成功地继承了李约瑟博士撰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宏伟计划,而且将研究所发展成西方世界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究中心。

曾经有人当面赞扬李约瑟博士,说全人类都欠你一大笔账,因为你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是何先生也指出:“既然李约瑟研究所全靠国际上的资助,它就应该对国际上有关地区的科技史研究者作出贡献,让人们有机会利用这个研究所,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学者。”“中国大陆从事科技

史研究的人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而出国作研究的机会则相反比较少。协助李约瑟出力最多的是华人,我就应该从华人方面先着想。”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情怀,何先生对来自华人世界的访问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青年人就格外热情,都给予了热情接待和指导,从剑桥的学术传统到英国的社会习俗,乃至围绕着李约瑟研究所和《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写作计划的种种趣闻轶事,不厌其烦地介绍,以便他们能够尽快熟悉这里的环境。

何先生对推动中国大陆科学史家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那是“文革”结束不久的1978年,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聚会中,何先生向在场的夏鼐、席泽宗、杜石然等学者提出:自1956年竺可桢、李俨等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之后,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科学史舞台几乎失去踪迹;又言及多次听到李约瑟为此表示遗憾,因此提议组织一个国际性的中国科学史系列会议。在场的学者立即拍手赞成并一致推荐何先生在海外操办。后来这一系列会议发展成两支:其一仍沿袭旧名,其二扩充为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两个系列会议都吸引了包括许多中国年轻人在内的世界各地学者参加,现已成为国际东亚和中国科学史领域的两桩盛事。从发起开始,何先生不但每次都躬身亲莅,而且热心地帮助组织者解决各种困难。

2002年何先生功成身退。忆及往事,他以诗意的文字描述当时的心境:“我以轻松的心情离开剑桥,想起伍连德博士当年教导子女的一句话:‘做事情要担得起放得下。’也许一个做义工的人很容易做到这点,但是没有金钱上的报酬不等于没有其他方面的报酬。我在李约瑟研究所任职期间,很欣慰地看到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海峽两岸的大学,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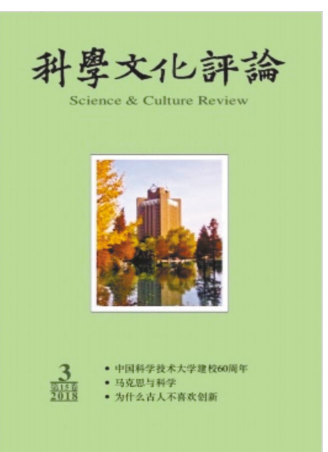
日本和韩国大学的年轻研究者能够共聚一堂,不分国家、地域、门派地友好相处,切磋讨论学术问题。”他又说,“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学者,经历过在李约瑟研究所逗留的一段时期,得以和国际上的同辈齐名。他们的学业和事业成就也令我感到欣慰。我认为这是金钱所不能替代的最好报酬。”

2014年10月18日,何丙郁先生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家中辞世,享年88岁。翌年7月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14届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会议上,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何丙郁先生的学术研讨会。

据说何先生生前曾对家人讲,“哪天你们如果中了六合彩,一定别忘了给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做点什么。”“六合彩”只是先生一贯的幽默话语,其家人却谨记于心。2018年3月,何先生的女儿何淑姬代表母亲冯美瑶和其他家人,写信给李约瑟研究所现任所长梅建军,表示愿意捐赠50万英镑,以纪念何丙郁先生及其对李约瑟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史研究事业的贡献。梅所长与研究同人及中外有关人士商议后,决定以何先生家属的捐款为基础,设立“何丙郁中国科技史奖学金”基金,并向社会各界发起募捐活动,以进一步扩大该基金的规模和影响。

2018年6月9日,借李约瑟研究所之友友谊会在北京科技大学成立之际,以何先生家属捐款为基础的何丙郁基金募捐活动正式启动。截至12月底,何丙郁基金已收到中国、英国、美国60多位学者的慷慨捐款,捐款总数已接近4万英镑,其中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2万元人民币来自北京科技大学84岁老教授韩汝功。现在“何丙郁中国科技史奖学金”的首批招募工作已经开始。

义何丙郁先生九泉下有知,定会欣慰地感到“吾道不孤也”。



2018年5月,在被创新、区块链、人工智能这些词语充斥的杭州云栖小镇“2050大会”上,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张卜天“不合时宜”地作了个发言,发言稿经整理后全文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8年第三期上,文章标题即为吸引眼球的“为什么古人不喜欢创新”。

在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当下,创新的呼声已是时代强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全文中,“创新”一词就频频出现了59次。如此看来,作者张卜天这番谈话是否真的不合时宜?在通读文章之后,读者当会有不同理解。

该文主要回溯了三个概念:“创新”“创造性”和“现代性”的历史。在古希腊,创新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带有贬义和负面的意义,特别是在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创新等同于异端,19世纪出现的“社会创新”一词,意在用创新来讽刺社会改革者。法国大革命之后,创新和革命联系在一起,人们开始反思对创新的批评,创新才开始被赋予正面的含义。英国哲学家、功利主义者边沁对创新概念进行了重构,在其核心意义中注入了“进步”和“功用”的概念,自此,创新的讨论开始从个人转向社会,从个人责任转向社会责任。在19世纪之前,创新和科学毫无关联,从19世纪开始,发明家才开始使用创新来强调自己的发明值得认可。熊彼特之后,经济领域的创新概念深入人心,成为现代技术创新的重要理论来源。

早期的创造性一词,主要特指上帝从无到有的创世活动。古希腊及其他诸文明因为文化方面的原因,早期均缺乏创造性的概念。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创造开始被认为源于个人的能力,而非神的能力,创造性成为艺术的本质特征。现代性的概念和创造性类似,也是最先出现在艺术领域。

把视线从历史转向当下,张卜天提出,强调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现象,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但它的种子在现代性形成之初,大概在14世纪的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埋下了。

(栏目主持:罗兴波)